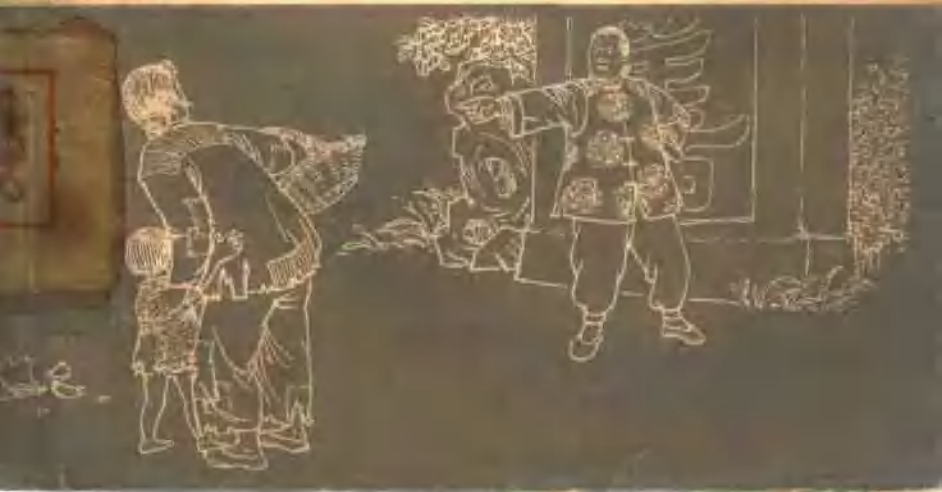




血泪童年

刘玉琴

吉林人民出版社



血 泪 童 年

刘 玉 琴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4·长春

血 泪 童 年

刘 玉 琴

吴 井 文 插 图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统一书号：3091·149

印张：1 1/2 字数：19 千字

印数：1—66,000册

1964年12月第一版

1964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3)：九分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刘玉琴同志对自己童年的血泪回忆。

刘玉琴老家山东，一家八口，被地主所逼：父亲闢了关东，爷爷得了半身不遂，大娘遭地主奸污悬梁自尽，伯父忧愤过度成了疯子，母亲又被匪军迫害而死。一家人被万恶的旧社会欺压、逼迫得七零八散。只剩下孤苦伶仃的小玉琴在死亡线上挣扎着。她讨过饭，当过童养媳，做过童工，当过佣人……。童年，带给她的只有悲痛和仇恨。

解放了，共产党和毛主席把她从苦难中解救了出来。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她成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每当我看到那些背着小书包愉快地走向学校或者在公园里玩得兴高采烈的孩子们时，就会情不自禁地自语道：“多么幸福的童年啊！”这一切，在今天的社会里都不足为奇了，可是在旧社会里穷人家的孩子怎么敢想呢？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时代……

(一)

我的家原来住在山东省掖县刘村。家里有爷爷、奶奶、大伯、大娘、父亲、母亲、我、妹妹（大伯的女儿）共计八口人。从我记事起，就知道家里很穷，天天吃糠嚙菜，有时连这些也吃不上。爷爷给地主家累死累活地干了一辈子活，连一条不上补丁的裤子都没挣下。奶奶受了一辈子苦，身子骨不硬实，得了个心疼病，只能干挺着。有一天，她把我大伯和父亲叫到跟前说：“你爹苦苦干了一辈子活，咱全家也跟着挨了大半辈子饿，你们得要点强……”没等说完就死了。

我大伯和父亲，記住了老人临死时說的話，每天起早貪黑，拼命地干活，可是仍然是糠菜充飢，有时也还揭不开鍋，日子到了沒法熬的地步了。爷爷沒有办法，不得不含着眼泪，打发父亲出去“闖关东”。

父亲走后，家里的生活更苦了，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娘又生了小孩。有錢人家生儿女是大喜事；穷苦人家生一个小孩，却是个累贅和負担。为了还地主的債，大娘不得不忍痛把自己刚滿两个月的嬰兒的奶水掐断，去給地主家当奶娘。

地主的欲望是个无底洞，大娘的奶水当然无法把它填滿。債，不仅沒有还上，反倒越滾越多了。地主的狗腿子天天登門討債，鬧得我們家坐臥不安。一天，他們闖进屋，不容分說，就把大娘拉走了，說是讓她給地主家当长期佣人，抵偿欠債，实际上，是地主老財起了歹心，想霸占我大娘。从此以后，大娘就掉进了老虎口。大伯又急又气，天天偷偷地到地主家門前轉悠，想要把大娘搭救出来。可是，他每次都是被狗腿子打得鼻青脸肿地跑回家来。

一天，已經深夜了，大伯还没有回来，全家人十分着急，四处寻找，找到地主家門口时，发现大伯倒在地上。原来他来看大娘时，被狠心的地主狗腿子把

右腿給打斷了！鮮血流了滿地。從此，大伯變成了殘廢。好好的夫妻被地主活活拆散，再加上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摧殘，大伯被逼成了瘋子。

這時，大娘生的孩子還只有幾個月，由于斷了奶水，每天吃些地瓜葉度命，瘦得皮包骨，不久也餓死了。

大伯被逼瘋，孩子餓死的消息傳到大娘的耳里，大娘苦上加苦，再無心活下去了，就在一個黑夜里，偷偷地上了吊。

爷爷由于长期受累，得了癱瘓症，再加上眼前的遭遇，連氣帶恨，從此倒在炕上再也起不來了。

我們家里，除了瘋大伯、病爷爷，只有我和母親兩個人了。生活怎麼辦？真是走投無路！最後，母親只好領着我出去討飯。

討飯更難。那時，日本鬼子、國民黨、土匪到處橫行、搶男霸女，女人們為了自身安全，盡量少外出。但年輕的母親為了一家人能活下去，只得硬著頭皮出去討飯。

我和母親每天東討西要，也討不到多少；因為大多數人家，都和我們一樣窮，他們同情我們，卻無力周濟；有錢人又哪顧窮人的苦，不僅吝嗇得一毛不拔，還時常辱罵欺侮我們。有一天，我跟母親走到一家地主的大門口，苦苦哀告了老半天，一個胖胖的地主婆

走了出来，对我们开口就骂：“你们这些臭要饭的，有东西宁可给狗吃也不能给你们！给狗吃还能看看家呢，给你们吃有什么用！”母亲忍着这恶毒的辱骂，指着我说：“可怜可怜孩子吧，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谁知她冷笑一声，唤出了她家的看门狗，狗仗人



势，恶狠狠地向我和母亲猛扑过来，母亲一面护着我，一面领着我就跑。但两条腿哪有四条腿跑得快，母亲的裤子已经被大狗撕破，腿肚子上被咬了几口，鲜血顺着大腿直往下流……

逃脱了大狗的追赶，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本来就空着的肚子，这时“咕咕”地叫得更难受。我越走越饿，最后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地上说：“娘！我饿，我要吃……”娘为难地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快起来，咱们要去……”但是，上哪去要呢？已经要了大半天了，筐里还是空空的！母亲好像也想到了这点，

她呆呆地站在我身旁，泪水从她眼里流出来，滴到我的脸上。我那时虽只有八岁，可是已经懂事了，我见母亲哭了，就赶紧说：“娘，咱们走吧，我不饿了。”

快到太阳落山时，我们娘俩好容易在一家碾房要到了一瓢麸子糠，我高兴极了，心想这回可以吃点东西了。

到了家，妈赶快点火，烧了一锅开水，准备做点糊糊，全家人喝一顿充充饥。谁料还没等往锅里下麸子面，就闯进两个匪兵，硬逼着向我们家要粮。说我们家烟囱冒烟就是有粮的证据！

他们在我家翻了半天，也没见到一粒米，最后，竟对我妈起了歹心，想糟踏她。我妈挣扎、反抗，咬伤了匪兵的手。匪兵歹心没得逞，老羞成怒，操起水瓢，从锅里舀起一瓢开水，就向我妈脸上、身上泼去。我妈被烫得在地上乱滚，不一会儿，浑身上下都起了鼓溜溜的大水泡。一连几天一点东西也吃不下，病势很重，又没有钱医治，只好眼看着妈被伤痛折磨。

妈病了，家里能活动的人，就剩我一个了。我知道母亲已经好几天没吃一点东西，就一个人跑到外边，想给她要点东西吃，幸好一家穷苦邻居给了我两个地瓜叶掺豆面做的馍馍。我拿着馍馍高高兴兴地跑回家，

見母親正躺在炕上睡覺呢。我輕輕地上了炕，趴在母親身旁，低聲喊娘，可是，怎麼叫她也不醒。這時，爷爷才告訴我：“你娘死了！”

“娘真的死了？”我不相信，我拼命地推母親的頭，搖她的胳膊，想把她叫醒，但母親却再不張口了。

我們窮得連飯都吃不上，哪有錢買棺材，沒辦法，只好用全家僅有的一床破被和炕席裹着娘的屍體，草草地埋了。

娘死后，爷爷為了讓我活條命，就把我給了一家姓劉的。不久，劉家因生活困難，又把我轉賣給了一家姓李的當童養媳。不久，李家兒子得病死了，又把我轉賣給一家姓孫的當童養媳。

老孫家是地主，家里很有錢；但是越有錢就越不拿窮人當人看待。那時，我名義上是他家的童養媳，實際上是她家的奴隸。一天到晚，什麼活都得干：做飯、打水、砍柴、割草。干活時，還得背着他家的小兒子（我的“丈夫”）。

有一回，孫家的老地主婆叫我去刷鍋。我想把孩子先放到地上，等刷完鍋再背他，可是還沒等放下地，那孩子就哇哇地哭起來了。地主婆操起燒火棍照我頭

上就是一下子，把我的脑袋打了个大包；我没敢哭，也没敢用手去摸，赶忙又从地上背起了小孩去刷锅；不料小孩不老实，一不小心就从我背后掉到了锅里。这下子可惹了大祸，地主婆硬说我有意摔她孩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操起锅铲子劈头盖脸地向我砍来，砍得我脑袋直流血。这场毒打，打得我遍体鳞伤，但还不许我哭；只有到了夜里，我才敢在自己睡觉的草堆上偷偷地哭。

姥姥（外祖母）听说我在孙家受虐待，有一天来看我，见我满脸满身都是伤痕，就心疼地哭了；我见了姥姥，一头扎进她的怀里，哭着求她把我救出这个火坑。正在这时，孙家的地主婆来了，她对姥姥说：

“这个小瘦猫，可是我们用二斗高粱换来的，你要可怜她，也不难，拿二斗高粱米来领她滚！”姥姥家也是穷人，哪有粮食来赎我呢？没法只好哭着走了。我望着姥姥的背影，呆呆地站着，心里难过、绝望，真想一下子死去。

过了一年，老孙家的孩子又得霍乱死了，地主蛮不讲理，硬赖她儿子是我给“尅”死的。她对我说：

“我儿子死了，你也别想活着！”当天把我和她儿子的棺材一块儿锁到碾房里，想把我活活饿死。

我在碾房里呆了一天零半夜，餓急了，就把地主婆給她兒子上供的飯偷吃了。吃完后，我知道自己又惹了大禍，第二天免不了還要挨一頓毒打，這還不說，再這樣呆幾天，還不得活活餓死？于是，我想到了逃跑。但是，門反鎖着，窗戶又高，上不去。最后我用燒紙的盆墊着，爬上了窗台，跳出了碾房，逃出了孫家這座活地獄，一口氣跑到了姥娘家。

過了幾天，孫家來要人，讓我回去，我死也不肯。孫家說：人不回去也可以，但得拿出錢來，賠償損失。好心的大舅母不忍心讓我再回到孫家去受罪，就把她唯一的財產——出嫁時用的手鐲、棉襖都給了孫家，這才算是把我救出了火坑。從此我就隨老娘家的姓，改姓任。

姥娘家的生活跟我們家一樣：二舅、三舅早都“闖關東”去了。大舅這時窮得實在沒法，最後也決定把家裡的破爛東西賣掉，領着全家去“闖關東”。

(二)

我和外祖父、外祖母、大舅、大舅母一家人，踏上了逃荒的路途。變賣家產所得的幾個錢，幾天就花光了，我們只好一邊討飯，一邊趕路。在路上經過了

六个月多的时光，最后才走到当时的“新京”（长春）。

白天，到垃圾箱里拣点什么东西糊口。晚上我們睡馬路，蹲墙根儿。就是这样，日本人和警察还要踢我們，赶我們走。

在“新京”呆不下去，我們又到了宋家洼子。这时外祖父病死了。当地的穷人可怜我們这一家人，給大舅找了点木匠活儿干，算是有了个职业，但生活仍然苦得很。吃的是糠皮、野菜、橡子面、豆餅。住的是冬不挡风，夏不避雨的一間茅草棚子。这年，大舅母又生了一个小女孩，小孩沒奶水，大舅母被逼无奈，不得不忍心把自己的亲生骨肉扔在洗衣盆里淹死！当时的情景，我現在还清楚地記得：盆里的水冒着气泡，小孩的一双小手直“扎撒”，舅母背过脸去，流着眼泪，我也吓得直哭。唉！在那个年月里，有多少穷苦人家的孩子，在他們刚刚降生人世的时候，就被吃人的旧社会夺去了生命啊！

为了生活，我不得不跟着大舅母到附近的工棚里去做些零活，給单身的工人們縫衣、补袜。可是，工人們的生活也很苦，他們自己还顧不上自己呢，又哪有錢給我們。他們出于阶级同情心，有时从自己的口中省下点吃的东西給我們。

記得有一回，我和大舅母刚从工棚出来，正好遇上了工头。他狠狠地打了我們一頓，又像一只餓狗似地跟在我們后边，到了一块高粱地拦住了大舅母。我吓得赶紧跑回工棚去喊工人，可是等我們赶回来时，大舅母已被奸污了。她受到这个打击和污辱，不想再活下去了，工人们百般劝说，又亲自把她送回了家。以后大舅母就再也不到工棚子里去做工了。

大舅母不做工了，家里又少了一个挣钱的人。为了活下去，我当时虽只有十一岁，也只好到一家油纸厂去请求做工。可是人家嫌我太小不肯要我。后来经人讲情，才把我当个“半价工”勉强收下。

名义上是“半价工”，实际上是干大人的活。我岁数小，身体弱，干起活来吃力，每天不知要挨多少打骂。虽然这样，自己还得硬挺着干，因为经常有人失业，我更是提心吊胆，生怕被裁下来。

可是，越是怕失业，失业就越找上头来。果然，有一天，在我上工时，工头给了我一毛钱，说：“你以后别再来了！”当时我心里难过的滋味就不用提了。

接着，我又到一家糖厂去当童工。为了怕失业，每天总是早来晚走，拼命地干，累得腰痠腿疼。但是

不久糖厂倒閉，我又一次失业了。

失业后，我心里很着急，千方百计地找干活的地方。后来听说“关东軍”仓库里雇人，我就想去。邻居王大娘提醒我说：“那个地方可是个‘老虎口’呀，你可得好好想想。”我还能想什么呢，生活已经逼得我走投无路了。我把心一横，说：“我什么也不怕，别人能去，我就能去，只要它雇我就行。”

我上“关东軍”仓库去卖工，那是一九四三年的初春，那时我才十二岁。

“关东軍”仓库，是一个大院，院墙用红砖砌成，上面布满了铁丝网，真像是一座人间地狱。

院墙外挤满了卖工的人，个个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大部分是十六七岁的大姐，还有少数的大娘、孀子和跟我差不多年龄的小姑娘。

天气寒冷，北风刺骨，我们穿的衣服又破烂又单薄，挡不住寒风的侵袭，大家只好依偎在一起，靠互相的体温取暖。我的手脚冻僵了，耳朵冻得更像猫咬的一样火辣辣地难受。等了好半天，雇工的哨子才响起来。

女工们听到哨子响，都跑着去站队，我也跟在后面跑去了。雇工的人逐对儿挑选，认为合格的，就发

一个木牌。我头一次来，没人跟我搭伴儿，再说，我又比别人矮一头，所以没有被雇上。

第二天，我又抱着很大的希望前去应雇。工头不但不雇用我，而且还辱骂我说：“你这个不会下蛋的瘦小鸡，还想到这儿来找食吃？”我一连去了五、六天，天天失望而归。

有一天，已经雇完工了，看着被雇上的人往里进，我难过得蹲在墙根角流眼泪。突然一个亲切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小妹妹，你哭啥？”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我向她说明了一切，她很同情地安慰我说：“小妹妹，别难过，今天不行，明天你再来，我帮你想点办法。”这位大姐就是现在我常常提起的紅秋姐姐。

第二天，我早早地到了仓库，不一会儿，紅秋姐也来了，她手里拿着一个小板凳，领着我来到每天雇工站排的地方。她四处打量了一下，就迅速地把小板凳放在墙根角上。正当这时，雇工的哨子也响了。大姐推了我一把，指着小板凳说：“快！快站上去！”我还没等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站了上去。大姐随即掩护似地站在我的前面。我的心怦怦直跳，神态慌张，大姐似乎感觉到了，就用手扯我的衣襟，暗示我不要怕。

过了一会儿，雇工的走到大姐跟前，打量了我们一下，给了她两个小木牌儿。我就这样在红秋姐的帮助下，进了“关东军”的仓库。

在“关东军”仓库干活，每天都要闖三道大关：第一道是雇工关；第二道是鬼子、工头欺压污辱关；第三道是放工时经过的总门口关。

我已经闖过了第一关，接着就闖第二道关。我们主要是给关东军送军衣、毛衣、毛袜、军用地毯等物，有时也干些笨重的杂活。干活累，自不用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鬼子、工头的欺压。当时看管我们的一个是日本“鑰匙官”，他管仓库，身上挎了一大串鑰匙，身穿军衣，挎洋刀，两只阴森森的眼睛活像个吃人的魔王。另外一个叫“李小鬼”。他整天跟在日本鬼子屁股后面，对日本鬼子点头哈腰，溜须拍马，所以得了这个外号。又因为他长了满嘴大黄牙，左腿有病，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好像一个被打伤的狗，人们管他叫：“瘸腿狗”，“够缺德”等外号。

他俩狼狈为奸，对我们女工又凶暴又残忍。我刚入厂不久，不懂这里的规矩（日本鬼子订了很多规矩限制我们工人。其中有：干活不准谈话，挨打不准停工等），跟红秋姐一起坐在地上送军衣，我本来年纪小，